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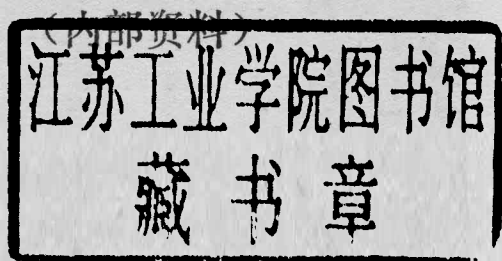
凤城文史资料

第五辑



凤城文史资料

第五辑



政协凤城满族自治县委员会
学习文史委员会

编

1993.9

《凤城文史资料》 (第五辑)

目 录

(一)

庠序沉浮一老翁

——记王奉璋的一生……………王作礼 (1)

敌后武工队长贺汝渭……………孙锡泰 (18)

解放战争期间凤城的群众文化活动……………陈世刚 (26)

(二)

日伪时期凤城的工商业……………秦玉武 (30)

伪满时期凤城县警察大队及警

察局的建立……………刘秀珍 (83)

鸡冠山日本守备队的罪行……………门 枢 (88)

鸡黑惨案……………冯正文 (93)

旧社会凤城的花子房……………秦玉武 (97)

陈德源匪帮的罪行及其下场……………刘秀珍 门 广 (105)

(三)

我在国民党中央军校的日子里……………杜龙华 (110)

有关国民党凤城县党部的几件事……………刘国士 (119)

庠序沉浮一老翁

——记王奉璋的一生

王作礼

我是王奉璋的第三个儿子，对父亲的一生，我知道的并不全面，只能把记忆比较深的印象写出来。

一 先祖渡海到辽东

我的高祖王作发，本籍是山东省登州府福山县古现村。远祖式微，单传七世，至祖公作发，生计益窘，乃与原配李氏，携女航海而来辽东登岸，至复县东登的宋屯租房而居，出佃而农。至清道光三年，始以制钱二百三十吊，典房地而入籍了。

高祖无子嗣，某日，作发公到城办事，宿王家店，当时十月，天寒微雪，院里一名贫儿约五六岁，赤身露体，与犬同食，引起作发公怜悯之情，问诸店主。主曰：“此儿无家，来店月余，驱之不去，亦无恤之者，故与犬同卧同食，公既无子，可子矣。既拯其命，且得嗣焉。”公竟动，店主向公索钱二十吊，为儿购置衣裳，认公为父，从公而归，名命玉基，为之定婚。

时公年四十余，由此家渐充裕，乡里见公家道有成，虽有养子，宜昌血统，乃劝公娶傅氏，仍与李氏同居。傅氏于道光二十六年生吾祖，命名振基，继生兴基、喜基、财基。公于同治二年七月卒，逾年正月十五日复生遗腹永基与玉

基，兄弟共六人。

后来，丧事频来，家道衰落，乃于同治五年十月六日，兄弟六人拆居。兴基随其岳家金姓赴东丰，玉基迁通化。同治八年，吾祖振基携其母弟来安东。

二 茹苦读书

曾祖父王振基，生育子五女五。为谋求生活之路，把家搬到安民山前。

陈翼长巡视东边道，决定成立安东县，要把县城设在安民山前。安民山前打出了街道，定出了号地，曾祖父振基买了一个号地，领着五个儿子盖上房子，就开了匠铺，从此，十里八村的人，都称“王家木匠铺”了。

祖父王伯忠，年二十娶由氏为继室，生我父命名温厚，字仁亭，号奉璋。父亲有弟弟二人，妹妹三人。

曾祖父对我父亲说，你一定要读书，咱们不求升官发财，只希望你能拿起个“戒尺板子”（当教书先生）就可以了。自此我父亲进了私塾。

父亲十二岁时，经他的祖父振基送入私塾，学规颇严，每有一字不识，师必责教。父因背书不熟，手曾被老师打得红肿，归不敢言，我祖母知之，仍以严肃的面孔教育我父亲“一定把书学好”。

父十七岁，叔叔十三岁，兄弟二人读书。祖父因病故去，祖母早起晚睡，编苇席子维持生活。

父二十二岁，考入安东师范讲习科（后改为师范简易科），虽有官费，但零用自备。这时，仍靠我祖母由氏织席补助，加上我妈在结婚时带来的几个钱补助父亲穿的。在安东师范讲习科攻读四年期间，月考、期考、年考、毕业考

试，共四十八次，每次都名列第一。

三 刚直闯宦途

师范毕业了，他被派到安东县龙泉山、汤山城高等小学当校长。后来，被派到庙沟办高等小学，他看到教室不足，就亲自领人把庙里的泥胎佛像打碎清除干净改为课堂。

毁庙办学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大事，惹起了当地土坤财主的反对，联名写信控告到县衙门，父亲决心离开庙沟。

离开庙沟不久，父亲担任了安东县教育局教育会长职务。

他当教育会长，真想把安东县的教育办好。可是，教育经费被安东县知事陈叔六贪污了。他一气之下，一面亲自贩卖稗草解决教育经费，一面写信把陈叔六告到南京政府。

陈叔六的根子很粗，在南京政府里有人，时间不长，陈叔六被调走了。他不但没有受到什么处分，还调到别处高升了。

父亲贩卖稗草想解决教育经费，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赔了帐，他一看没有路可走，便毅然辞掉了教育会长职务。

张作霖在东北当督军，搞了一次考俊士，父亲考上了俊士，因为成绩优秀，是普通文官荐任存职。

他被派到锦西、义县当劝学员。交通不便，他省吃俭用买了一匹枣红马骑着。劝学员的工作是不好干的，挣几个钱不够养活家口，况且离家太远，他就辞了职，骑着枣红马回家了。

奉天省公署、省长王永江派他到复县公署当科长，他在复县工作了六年，地方上的区官准备给他用设赌抽红的办法弄些钱财，每次都被他拒绝了，接着他又转到镇东、清原等地当科长。

父亲在外边干事情，没有带家眷，每年只回家一次，都

是腊月二十六七回家，过了正月初三就往回返。

每次父亲回家时，我祖母由氏都嘱咐他说：“咱家是穷人，你在外边做官，千万不要贪赃枉法，不要花不义之钱……”。父亲把祖母由氏的良母事迹呈报了奉天省公署。后来，奉天省长王永江发给了褒奖证书和大匾额一幅，上边写着“彤管流芳”四个大字。

张作霖为了安排张作相当个省长，特地将洮南县改为洮南市作为省会，派我父亲去洮南市当市长，仅一年多时间。

他在洮南市当市长，一个沙土扬天、只有马市的市，没有什么大事可做。年终回家过春节，他决心不再回去当市长，把行李统统带回来了。因为他算了一笔帐，当市长一年的薪水所得的奉票，带回安东兑换小银元，还比不上乡下的一位小学教师的薪水多，怎能维持家里的生活呢？

一九三〇年（民国十九年），他在家里和叔父一起种地，自己家里的地不够种，又向地主租了两天（十二亩）地。他整天赶着车，驾辕的是从义县骑回来的老枣红马，一条毛驴拉套，拉泥、拉粪、种地、拉草……当地的士坤见了都称赞他是好样的：“外出做官，回家赶车、种地”。

我家住的破草房子几年一苫，泥打的墙一年一抹，屋里没有棚子，墙壁上的几张纸，都是每年春节前的一两天糊上几张旧报纸。父亲在外边干事，积攒几个钱，除了还上了祖辈分家时分得的八百元小洋钱的“饥荒”外，又打发我三个姑姑出嫁了。

他每次回家过春节时，下了火车，就到大买卖家里打个小年纸包，里边包的是香纸、蜡烛、红糖、白糖、红枣、二斤

糕点，还有按家里人数买的每人一双袜子、一副腿带，有时买个灯罩，有时买套茶壶、茶碗。

在家种地的时间不长，东边道林科高级中学校长李庚囊，原来是父亲在师范读书时的校长，他听说父亲辞官在家种地了，几次托人捎信，请他到林科中学教国文，父亲考虑到家庭生活，就答应了。

到了林科中学，李校长让他担任高中三年级的国文和经学教师，在校务分担上给了训育员的职务。

四 亡国的大祸临头

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沈阳，几百名关东军乘坐满铁的火车，一天功夫就占了安奉铁路沿线。学校关门了，学生回家了，父亲也只好回家收割庄稼了。

第二年学校又复课了，父亲又回到林科中学任教员。学生用的课本，仍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，还作为学生的必修课。学校增加了日本人教日语，姓永田，原是七道沟满铁附属地的日本人。他来到学校只知教授日本话，别的事情一概不管。学生经常和他开玩笑，明里暗里称他是“小头鬼”。

日寇依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，在较短的时间里，占领了东三省。因有杨靖宇领导的抗日联军的活动，使其统治很不稳定。于是，关东军决定实行“思想讨伐”政策，目标是对着知识界、教育界、工商界里的著名人物，尤其是对着所谓“反满抗日”活动分子。

一九三六年九月末（阴历），冷气袭人，林科中学的学生，三个一堆五个一簇地低声暗语议论着不幸的消息：秦校

长、李教务长、侯训育主任，还有伪安东省公署教育厅的孙厅长、安东县教育局邓局长等等，都被宪兵队、警察厅抓去了。

阴历十月初五的晚间，炮灯铃打过了，我在父亲的住室里已经脱下衣裳刚刚躺好，父亲到各寝室去查看回来，屁股没等坐下，外边敲了几下门，进来两个中国人，头戴礼帽，身穿西装，手提文明棍，戴着眼镜，面带冷笑地说：“你是王奉璋吗？”

“是！我就是王奉璋。”父亲直率地回答。

“警察厅有事请你去一趟！”一个说。

“什么时候去？”父亲马上想到秦校长等人被抓的情景。

“啊，马上去。”

父亲立刻收拾一下东西，准备跟着两个特务走。有个特务假惺惺地说：“天气比较凉些，你把风衣穿上，别受凉了。”

话刚说完，两个特务忙在父亲摆着书的桌子上翻来翻去，约有二十分钟，父亲把衣服穿好了，特务也把各种书籍翻了一遍，有个特务来到我的床边，假装和气地说：“小孩，你不要害怕，告诉你们家里人，你父亲去一趟，很快就会回来的！”

特务把父亲带走了，不到五分钟，一阵阵警笛声，从外边传来，几辆警车亮着刺眼的灯光，一溜烟地奔驰而去。

父亲被带到安东警察厅，进门一看，地板上坐的全是教育界、工商界的头面人物，人都是靠墙跟坐着，中间有个木桶，是小便大便使用的器具。

一天三顿饭，全是些小窝窝头，一块咸萝卜，给点水是喝的，不是给洗脸用的。

在警察厅里只问了参加抗日救国会的经过，组织人员名单，谁参加了？父亲始终以“不知道”对付他们，在警察厅住了一个星期，便被送到日本守备队了。

二三十人，住在日本守备队的马房里。三间大房子是砖瓦建筑的，高大宽敞，没有间壁，地面是水泥抹的，这房子本来是守备队用来拴马的，这次为关押中国抗日分子，才倒出来的。水泥地面上放几张苇席子，给被捕的人当炕席用。守备队通知被抓者的家属送行李，只准许送一褥一被。

一九三七年元旦过去了，日本守备队来电话告诉我们，快到守备队去取行李。去守备队那天，大雪刚停，马路上冰天雪地，我们走进日本守备队的办公室，有位中国人是翻译，金县人，他说：“你父亲是前天夜间坐火车到奉天（即沈阳）的。你父亲没有什么事情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”日本兵把我们带到马房里，只看见父亲的被褥放在一角。我们打开一看，里边沾满了紫红色的血迹和脓水，见此情景，十四岁的我，忍不住悲痛之情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祖母盼儿脱离虎口，受了我二舅爷的嘱咐，吃素念经，祈祷观世音菩萨保佑。母亲成天吃不下饭，身体虚弱成病，亲友经常到家打听消息，并对祖母和母亲极力安慰。

父亲在奉天日本宪兵队监狱里蹲了一个多月，腊月二十八午后一点左右，看守进来，叫喊说：“都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，等汽车来了好上车。”接近两点钟，院里来了汽车。看守叫安东来的十一名“罪犯”，有教育厅长孙文敷、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、安东教育局长邓仕仁等人（这是被

枪毙的)，不大功夫就被汽车拉走了。看守又叫了二十多名被判十五年徒刑。第三次叫的是被判十三年六个月的。最后叫我父亲，约有十几个人，被带到日本官面前，日本官说，放你们回家，要安分守己，你们是属于“要案视察人”。

释放了，父亲走出了监狱的大门，要回家可一分钱没有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忽然想起一位在奉天开个小店的乡亲，在他那里借了路费，坐火车回到安东。

父亲进了家门，放声大哭，全家老小都哭起来了。父亲听说祖母由氏为儿子脱出虎口而吃素，更是泪流不止。以后，每当吃饭时看到祖母吃素，更燃起我对日寇的仇恨之火。

正月初一，父亲声泪俱下地向全家人诉说起被捕后的情况：

在警察厅里，只是问一问；几天后，便到了日本守备队，进行酷刑逼供。第一次是灌凉水。把父亲绑在板凳上，日本兵掐着水管子往父亲的嘴里灌凉水，灌了一阵子，逼问父亲什么时候参加的救国会，父亲闭着嘴，表示什么也不知道。日本鬼子停下了灌水，让父亲回去好好想一想。第二次是坐老虎凳，第三次是“上大挂”……父亲忍着酷刑拷打，始终没有讲，只说学生会、教育会，没听说有救国会。

因为日本鬼子使用胶皮轱辘的带子打人，使父亲胸前、背后和头上生了一年多毒疮，经过用艾蒿水洗，才慢慢好了。

由于父亲是“要案视察人”，所以，警察、宪兵三天两头到我家查问。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，还逼着父亲写了一篇“感想”。一九四三年，伪满皇帝到安东视察。没来之

前，安民分驻所警察把父亲送到大东沟警察署拘留，每天三顿饭都由我四祖父家里送去的。溥仪回到了新京（长春），才把父亲放了回来。

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。父亲高兴地说：“这回可好了，压在我头上的国事犯帽子可算拿掉了。”父亲给了我两角钱，叫我到安市里买些红绿纸、孙中山的像，要好好庆祝庆祝。

五 第一任教育厅长

一九四五年九月间，伪满时的安东省立第一国民高等学校，被安东地区治安维持会改名为安东农林中学，由董以军代理校长。董以军是我父亲的学生，邀请我父亲来校帮他掌管学校，于是，我父亲便来到农林中学当国文教师。

当时学校里有些教师和学生，常常以伪满统治时的一套教学、管理方法进行工作和活动，为此，我父亲针对当时情况指出，日伪统治下的教育是“奴化教育”，应当废除。使教师和学生脑子里有个正确的认识。

社会上当时流传着许多毫无根据的诽谤性言论，如说安东市的八路军，南京不承认，延安也不承认，中央军来不了，是因为土匪扒坏了铁路造成的……

父亲在课堂上或在全校师生朝会上向学生讲，我们被日寇统治了十四年，对祖国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，不要轻信社会上那些流言蜚语，学生就是要安心读书，不要上他们的当。

十月末的一天上午，安东的“大学联盟”派了两个人，一个是卢英权，一个是李瑞文。卢英权向学生讲，日本投降了，土匪到处扒铁路，使中央军不能接收，青年人在伪满时

要想爱国没有机会，现在正是机会，我们要武装起来，去欢迎中央军来接收。

他俩走后，全校师生在父亲的影响下，向学校说明，我们学生就是读书，伪满时我们没能起来抗日，现在光复了，我们怎能拿起枪，让中国人去打中国人？

不久，发生了“三股流反革命暴乱”。八路军团长王选桥，带领战士把反动武装全歼后，问学生你们学校的老师有没有叫王奉璋的？其中有个学生说，听说王奉璋在农林中学当教师。

王团长把战场清理完毕，当天午后，吩咐了一名通讯员到安东农林中学请王老师来叙谈叙谈。

午后约三点钟，我和父亲在宿舍里忙着备课，来了一位八路军，身穿黄色的粗布二大褂子，腰上带着土造的手榴弹，还带着一支长木匣子手枪，腿上裹着绑腿，推门进来了。当时，我们心里很紧张，心里想，三股流的枪声和咱们也没关系，八路军来干什么？

通讯员进门就问，这里有王奉璋吗？父亲说，我就是。通讯员从腰里掏出用便纸折成的信递给父亲。父亲带上老花镜边看边想，嘴里念叨着王选桥的名字，一时想不起来。父亲抬起头对通讯员说：“你请坐，王团长有什么事？”

通讯员说：“王团长请你去，和你叙谈叙谈。”

父亲穿起了大衣，跟着通讯员走出了校园。

原来王团长一面派通讯员到农林中学请父亲，一面在老乡家里准备点菜和酒，等父亲去叙谈离别之情。

父亲和王团长饮酒之间，各自叙谈了自己的经历和遭遇。王选桥讲了自己离开学校回山东参加抗日游击队的经

过，后又讲八路军到东北和苏军并肩战斗收复失地；父亲则向学生讲述了在日伪统治下如何遭蹂躏、坐监牢、受尽非人折磨的悲惨遭遇。一席话使父亲脑子豁然开朗，觉得只有中国共产党、八路军、新四军，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。

两人一直谈到晚上十点多钟，王团长派通讯员把父亲护送回家。父亲兴奋得睡不着觉，觉得自己书没有白教，学生里出了一名八路军团长，也有自己的一份光荣。

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，安东省政府成立了，通知市内三个男中、一个女中的教师和学生集中到日本人电影院（现在的音乐厅）听报告。省委林一山作了唯物史观、肖华作了关于人民军队、教育厅副厅长潘琪作了关于解放区的教育方针政策报告，最后是省政府副主席刘澜波作了关于和平民主建国纲领的报告，一共听了七、八天上午，每天下午看电影或戏剧。

父亲经过王团长的谈话和听了这些报告，从思想上认识到给自己脱掉“囚皮”的是共产党，解放自己全家的是共产党、八路军。

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，我和父亲都参加了安东省中等教育研究班学习，我们被编在第三班，班主任是杨达，她是刘澜波的爱人。

由于杨达的汇报，说我父亲在伪满时被打成“反满抗日国事犯”，坐过牢，刘副主席还专请我父亲和他谈谈。

第一次，父亲是坐省政府派的小汽车到的省政府，刘副主席穿一身灰色羊皮大衣，自我介绍是凤城刘财主的儿子，在东北大学念过书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跑到关里，流亡到

延安参加了革命。我父亲也把自己的身世说了一遍，在张作霖时代混过事，在林科中学当教师时被日寇打成“反满抗日国事犯”，幸亏共产党来了，才脱掉了“囚支”。这次谈话，主要是互相认识了一番。

第二次，杨达又通知说，刘副主席请我父亲再去省政府谈谈。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，刘副主席希望我父亲能出来做点工作。我父亲说，今年已六十岁了，能做什么？旧社会混了一气，也没做上官，也没发过财。况且共产党的政策，自己一点也不懂。刘副主席说，咱共产党既不为做官，又不为发财，只不过是“为人民服务”，请你出来，给政府当个“耳目”，群众有什么意见、要求，你能随时反映上来就行了。虽经刘副主席反复诚恳地说明，可是父亲仍表示胜任不了。

接着，安东省中等教育研究班要举行控诉日寇法西斯奴化教育罪行大会，在宝山电影院里摆上了祭品，还抓来了伪安东省教育厅教学官小林博、安市市教育科教学官前田好久，还有安东师道学校总务主任小野寺等，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疯狂迫害中国青年的罪魁祸首。

大会上，我父亲揭露了日寇制造的“安东教育事件”大惨案，控诉了日寇屠杀中国教育界、知识界、工商界人士的滔天罪行。我被推为书记官。会后对小林博等四名日本人执行枪决。

就在安东中等教育研究班将要结束的前一天晚上，安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潘琪，拿着一张任命状对大家宣读：任命王奉璋为安东省教育厅厅长。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大家一致表示拥护。

转过年正月十三，安东省政府开来了一辆黑盖子小汽车，直到我家大门口才停下来。一位穿黄色大衣的走进来问：“王奉璋厅长在家吗？”

我们家里人赶忙让坐，来人自我介绍是省政府秘书，是刘副主席派来接王厅长的。

父亲听了之后说：“对不起！请你回去转告刘副主席吧，我已经六十岁了，‘老朽昏庸’，怎么能出去工作呢？别开玩笑吧。”

父亲再三推辞，来人硬是不肯，最后来说：“您老不当厅长，咱们暂且不谈，新春佳节，刘副主席请您去，也应该去吧！”话说到这里，父亲再也不能推辞，家里人也劝父亲，还是去一趟才对，父亲只好随着来人上了汽车，同秘书一同到了省政府。

一九四六年开学不久，省政府除了任命父亲当教育厅厅长外，还任命他当联合高级中学校长。说起来好象笑话，父亲是穿着大棉袍子，带了什么《六法全书》（即伪宪法、民法、刑法、商法、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总称）走进教育厅办公室的。

在战争年代里，教育还是摆在次要地位。教育厅的副厅长是潘琪，秘书是杨达，一切大事小情，由潘副厅长和杨达秘书亲自去干。然而，共产党的干部很谦虚，团结党外人士，有事向父亲征求意见。父亲抱着知无不言的诚恳态度，有什么想法就给潘琪副厅长提出来作参考。

有一次，安东省政府主席高崇民在教师会上讲，伪满的教师，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，使中国儿童、青年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，这种罪行是杀人不见血的……会后，许多教师都情

绪低落，心怀不安。

父亲便向刘副主席反映，象高主席那种提法是否太过分了，当教师的帮助日伪统治是不错的，可他们也是为了吃饭才工作的。后来有关同志向教师解释，才稳定了教师的情绪。

一九四六年夏季，东北军政大学总校派曲指导员来安东招生，父亲为了使我受到革命熔炉的锻炼，便请刘副主席介绍我到东北军政大学总校去学习。

一九四六年十月，国民党反动派进犯安东，省政府接到命令要撤出安东。父亲随着省政府的人员一起过江。

后来，又撤退到黑龙江省，父亲担任牡丹江市文教局长，兼任牡丹江市中学校长职务。

有一次，父亲到哈尔滨参加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，在会上父亲提出了教师站在什么立场上教学，被列为会议讨论的问题之一，使到会的同志明确了当教师不单纯是传授知识，不能为教书而教书，既要教书又要育人。

一九四七年八月，父亲交待了工作，从牡丹江市又回到了安东省政府，任文教厅厅长职务。父亲写了份入党申请书，交给了省政府李涛秘书长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李涛秘书长对父亲说：“你不用入党，你入了党起的作用，还没有不入党起的作用大些。”

在战争年代里，机关、部队都自力更生，减轻人民负担，文教厅也是这样。父亲在文教厅里带头到蛤蟆塘种菜。同志们都说，王老种菜真内行。父亲说：“我在家时开过菜园子，多少懂点。”

辽东省政府成立后，父亲觉得文教厅里四个厅长，整天